



新人类文化丛书

跳不脱的 不完衣舞

迷失与自救
新人类女性的

敦煌文艺出版社
· 南
嫫
著



○ 南 嫫 著

跳不完的脱衣舞

——新人类女性的迷失与自救



书 名 跳不完的脱衣舞

作 者 南 嫫
责任编辑 李保军
封面设计 任 伟
版式设计 木 车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印 刷 张掖河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2
印 张 5.5
字 数 120,000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300
书 号 ISBN 7-80587-441-7/I·398
定 价 8.5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欲望仍是最本质的



中国人往往会为一个形而上学的观念做出不懈的努力。一句世纪末情绪让许多人感到了什么，于是趋炎附势人云亦云，人们感到世纪末不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类似世界末日的预订。

当人类对自身的开发和认识越来越逼近真空，人类为自己挖掘的墓地也越来越完善。我们已经对时光流逝的无奈有所发现，我们期待奇迹的热情有所减弱，一些较快觉醒的人知道自己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像记日记一样记录下每一天的变化，有用和没用都细录在案而已！

于是，有人为本世纪末最能代表中国都市文化的一代人作了总结性发言，或者说作了较完整的记录。敦煌文艺出版社推出一套“都市新人类”文化丛书，全面展示了都市新人类的



行为与思想，以及因之而产生的新人类文化现象。

面对这样的选题，我们会问：“都市新人类”是些什么人？他们处在都市的哪个层面？他们如何面对传统和道德？他们对爱情和婚姻持什么态度？等等。这些疑问对于大众来说，不过是一种对于另类、“非主流”青年人的模糊而片面的认识和怀疑。对于这部分的误解和片面认识随处可见，而权威和公正的认识却隐没在误读之中。“都市新人类”作为一个属于我们时代的都市灵魂和新的都市概念，仍然受到大众的深切关注。

这套丛书中我写的是一本专门探讨展示新人类女性的著作：《跳不完的脱衣舞——新人类女性的迷失与自救》。

当我们谈论女性问题时，我们总在说妇女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提高并有了多么多么大的变化。这变化到底是男人给予女人的，还是女人自己争取的？十九世纪女作家伍尔夫在她所处的年代曾为女人写了一本书，《一间自己的房子》，她在书中提到她翻看《英国史》时的惊讶，她在“妇女的地位”一栏找到了这样的文字：“打妻子是大家公认的男人的权利，而且不论上等人或下等人一律如此做而不以为耻。”伍尔夫写作这本书时，英国的绅士早已不会对此“不以为耻”了，可见妇女地位确实提高了，这是男人觉悟的结果，可能是他们已经不如古老的人类那么强悍了，没有多余的力气用于打老婆啦。

《跳不完的脱衣舞》认为：妇女对自己解放的最大贡献应该是来自她们自己的欲望，来自她们对男人的渴慕，来自她们对社会及其它物质的欲望，她们也动了占有之心。于是女人的解放运动也就是她们一步步更高的欲望满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时间的推移，而没有太多的高度的叠加。

女人的弱点是伴随着欲望值的提高而减弱的。当女人开始从自己身上脱衣服，其实和道德无关，也和时代无关，仅仅是

和她们想与世界亲近的欲望有关。在繁衣冗服的年代，也出现过邓肯这样希望展露身体的女人。她的的问题是，她提前感应到了终究会来到的这一天，那就是无论男人或者女人都会越来越亲近他们那个越来越小的世界，她做了这方面的先知，所以她得到了一个先知所应该拥有的诅咒，也得到了应该有的后人的赞赏。

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回避，每当我们谈到妇女解放运动，或者说甚至只要我们谈到“女人”这两个字，就会在脑袋里快速反映出与“道德”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人类的妇女解放运动就一直延伸着漫长的人类道德演绎。今天并没有在这个表现层面上有什么根本的改变。至今，我们还十分习惯于在道德前面加上“伦理”两个字，以显示我们古老的文明的根蒂所在。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另外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一些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浮上海面又沉入海底之后的，无数次的沉浮和更迭所带来的变化。

我的任务是记录下这些变化，我选择新中国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女性来表述，是因为她们是本世纪末之前表现得最完全的一代人。她们从一个旧时代启蒙，在一个新时代成长，她们注定要完成一部分使命，也注定会带着深深的时代的遗憾。在世纪末到来之际，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这代人对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影响与表现。当然，同样我们并没有期待这一代女性能够完成人类女性所包涵的众多问题，事实上，我们所感到的巨大变化也许仅是一层外表，当我们拿掉这层外表时，我们会发现，作为新人类女性在整个人类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一个脱衣舞女的角色。她们跳着永远也脱不完的脱衣舞，过程却令人充满欲望，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想对于脱衣舞台，道德仍是一个表象，欲望仍然是本质所在。

目 录



导言：逼近的现场_____ 1 ~ 20

传统，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逼近现场

第一章 寻梦者，殊路同归_____ 21 ~ 56

寻找金喇叭

行动意味着自由

第二章 女人是谁的天敌？_____ 57 ~ 73

女人不再是女人的天敌

女人仍然是女人的天敌

第三章 私人小说_____ 74 ~ 86

女性私人小说的先导和发展

第四章 Office 小姐，特定的

产物_____ 87 ~ 101

吃青春饭的 Office 小姐

Office 里新秩序的建立

Office 小姐对传统生活习性的颠覆

她们有没有跳出男性权力中心？

第五章 家庭角色_____102 ~ 122

新的家庭模式冲击
婚前性行为与今天的贞操观
第三者，仅仅是性伙伴吗？
有人发明了“第四种感情”
单亲母亲

第六章 谁敢不领风骚_____123 ~ 141

女性期刊的先导作用
消费观念的转变
女性消费的副效应
女性消费的主要趋向

第七章 诗的女性和女性的诗__142 ~ 158

今天女性的情感策略
诗意的弥补，早已打破的平衡
诗意的“风格”
女性诗对女性意识的自觉逃遁

第八章 对女性文化复兴的一次

狂欢式断言_____159 ~ 162

导言：逼近的现场



传统，历史给我们 留下了什么？

男权

社会对女

性角色的规定，挡在中国女人面前的巨大冰山；“五·四运动”不彻底的女性自救形式和变形的新的女性角色；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时代角色，女性角色的严重走失，和偏激的歪打正着；文化的再次复苏带来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觉醒之后的再次走失。



这本书讲述的是出生于六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女性，这个年代出生的女性，从呱呱坠地到今天，就被生吞活剥一般拉入了反

逼近的现场

传统的行列。这代人多少都有在半夜被“文革”武斗的枪炮声惊醒的记忆，在一场接一场的革命性运动的动荡之中，我们长大成人，对“革命”并不陌生，但也绝不如我们的上一代那么热衷。相对“文革”式的革命，这代人更快更如鱼得水地拥抱了旷日持久的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商业大潮，以及商业大潮下涌现出的文化多元状况，更快地接纳和宽容了泥沙俱下的惊涛骇浪。其实，何止是接纳和宽容，他们就是惊涛骇浪中的弄潮人。

但是，无论我们走得多远，我们都无法不先谈谈传统。因为“传统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我们生存的环境，而且是必备的环境，从我们最简单的动作到复杂的思想，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一切所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我们的传统。”（余华：《传统，现代，先锋》）的确，自从人类有了传统，我们就开始了反传统。反传统的色彩尤其体现在女性运动方面，道理很简单，人类社会至今维持着男人话语权利中心，对于两性世界来说，这是人类最大的传统。男人界定着女人，男人塑造着女人，几千年积淀而来的中国文化，更是乐此不疲，或者说对此麻木不仁。也难怪作家王蒙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却原来，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实现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是那么困难，比在法律上制度上社会保障上解决妇女问题困难得多！

我们面对的传统是强大的，诸如辜鸿铭这样国学深厚又满口英语的老先生，也绝不会放弃自己对女人的塑造机会的。

辜老先生把中国人的性格与中国文明总结出三大特征：深沉、博大和纯朴，最后，中国男人又说，除此之外，还要加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灵敏。

灵敏的典范是，中国男人三妻四妾方能后院不起火，谅你

要舍身为夫时，却当仁不让。对于这一点中国男人有着自己的“完美”注解。

中国男人在考察了西方之后，发现中国女人是全世界最乖的女人，于是回来后为中国女人的三从四德大唱赞歌，以此巩固中国男人的皇帝地位。

中国女人为何如此乖巧？不乖行吗？早在汉朝时期，董仲舒大人就为妇女制定了“夫为妻纲”的行为准则。几千年来，中国男人都致力于完善他们对女人的统治。他们为女人规定了“未嫁从父兄，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称为女人的三从；还有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为使男人们看上去很有道理，他们又为女人制定了“三贞九烈”的极端规范，要求女人们“极贞极烈”，时刻用生命维护封建秩序，维护男人们的尊严和理想。于是，男主女从、夫为妻纲、男女有别、夫贵妻荣、夫唱妇随等规矩应运而生，总之围绕一个封建帝国的核心：男尊女卑。

既然，女人生来就卑贱，为男人舍身也就如同人饥饿时屠杀其它动物来充饥是一个道理。然而，女人的舍身并没有换来男人的完全欢喜，男人们总是及时发现女人的毛病，例如妇人善妒。尽管皇帝自己把宫内的男人都变成了太监，却十分看不惯女人之间的嫉妒。南朝明帝就深恨妇人相妒，动不动就鼓励朝臣纳妾，并不允许臣妻嫉妒，若有嫉妒便不问青红皂白，拉去处决。不但如此，还命虞通之就他的处决妒妇的功绩写书传世。虞通之所著《妒妇记》，便是对所有女人的警告。如此，又怎么能说中国女人是自己“乖巧”的呢？

中国男人对女人也可谓教诲有方，几千年来，中国女人只读几本书，书名只要一摆出来，就知道它们在讲述什么：《女孝经》《女四书》《女儿经》《閨范》。为让女人们对自己的

行为有点成就感，也是为了让女人的行为有所参照，男人们又为那些符合他们想法的女人建立了贞节牌坊，修建了节孝祠。甚至，像节孝祠这样的建筑竟成为一种礼部制度，一级一级往下延伸，从省、府、州直到县都必须为女人修建这么一个节孝祠。也难怪“圣人”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为了把女人修理成他们的“贱人”，他们也确实费尽了心机。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人制”大于“法制”的，但是这个社会却为女人准备了一整套的宗法制度。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男人随时可以“出妻”、“休妻”，让妻子“下堂”，甚至还规定了严格的堂而皇之的七条休妻理由，称“七出”：“七出者，无子，一也；淫溢，二也；不事姑舅，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丈夫若喜新厌旧了，便可以拿出这七条中的任何一条，做出休妻的决定。在旧中国做个男人真可谓风光，即使这个男人在外面狗屁不如，在家里对自己老婆是绝对可以挥拳抡臂耀武扬威的。

旧中国的男人，不仅可以休妻，还可以纳妾。上到皇宫，有三宫六院里如蚂蚁般拥挤的嫔妃供皇上赏玩，下到黎民百姓中的男人也可以没有什么理由就纳妾娶偏房。因为这种男人享有的特权的存在，封建家庭中的女人地位的名次排列便十分严格。妻下有媵，媵后有妾；妻为正室，妾为偏房；母亲也有八种不同身份的母亲：嫡母、生母、继母、养母、慈母、嫁母、出母、庶母、乳母、君母、大母、假母；而根据正室偏房不同所生的儿女也相应地按尊贵低下被排了队：宗子（也称嫡子）、世子、支子（也称别子）、庶子、嗣子等。一系列的伦理宗法，及相应的伦理范畴（既五常之道）真让那时的男人们出尽了风头，也让他们尽情地展示了所谓的理家才能。男人有性情时，

便给美妾画画眉毛，这一画竟也画成了爱戴女人的模范，那女人不知道被多少老少怨妇羡慕过。如此重大的幸福，对于大多数旧中国的妇女来说，简直不敢想象。而这幸福是男人给的，你又怎能不等待“夫贵妻荣”，不时刻巴结伺候着那个能给你幸福、也能致你于死地的男人呢？

而那些被关在家里的女人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哪些是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

长期的演变，使中国女人变成了另外一种社会动物，而这种动物在男人眼中不是人，在女人自己心里也不是人，仅仅是在人前加了定语的：女人。就像曹禺在《明朗的天》描写一个知识分子骂妻子道：女人不是人，女人是女人！

女人不是人，女人是被社会异化了的人。这个荒谬存在的渊源太深，我们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在今天，我们照样可以看到这种荒谬变形后的存在，甚至发展。

历史的发展结果告诉我们，也不能全怪中国男人为女人设置了众多枷锁，男人们的觉醒也是靠打开国门而获得的。

“五四”运动时期，一部易卜生的《娜拉出走》激动了多少中国的知识妇女，在把洋人的思想行为作为“救命稻草”的“五四”时期，中国妇女开始了对几千年恶劣习俗的清算。但这是一场几乎仅仅产生于知识妇女界的自救运动，她们用自己太微薄的力量反抗着庞大的社会，她们奋力发出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像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女人在撒娇，尽管这娇撒得也颇为痛苦，渐渐也变成了茫然的悲泣，但她们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在易卜生的感召下，女布尔乔亚们开始向自己丈夫索要自由，高喊要走出家门，然而当时能供给她们参与的社会工作又实在不多。一旦她们走出家门，同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必要条件。当时，她们并没有意识到，女人要获得自由并不仅仅是走

出家门那么简单，也没有意识到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已经在她们面前筑成了一座难以撼动的巨大的冰山。女人们从家里刚一出来就遇到了“该不该回家？”的矛盾和难题。当时知识女性反封建主义的常有行动是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爱情自由，她们误以为社会真的进步到了可以给她们自由和爱情，而不让她们付出的程度。

鲁迅创造了一个子君的形象，让她代表了一个出走女性的姿态，当她确实做到了“我是我自己的！”时，她已经被生存的危机击溃，走向死亡。如果说子君还在为出走感到自己十分了不起，甚至为此而兴奋的话，那么丁玲笔下的莎菲对出走已经没有了兴奋，反而充满了出走后的失落和惆怅。莎菲是以否定自己的方式来表现一个女性在当时环境下的艰难寻求。寻求什么？当时的女性以莎菲和子君为典型代表，都无一例外地抗拒家庭的束缚，但又无法从心理上彻底摆脱对家庭的迷恋，同时，她们又以“宗教般的热情”痴情于爱情。这种心理下的自救行为无疑是不可能找到根本出路的。

尽管“五四”运动时期新女性的追求，和她们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初级认定是不彻底的不完善的，但是她们的努力为以后的女性自救廓清了道路，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就早期的女性启蒙来讲，我们必须平心而论，女性的觉醒并不产生于她们自己，而应该记住那些最早在中国创办女校的洋人传教士，和康有为这一类的传播、主张并身体力行西方民主意识的启蒙者。早在一八四四年，英国传教士就在宁波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塾。一八五〇年美国人又在上海和福州开办了女塾。尽管，洋人社会也是以男权文化意识为中心的，但女性开始受到教育，开始知道了过去只有男人们才知道的事情，这就是开始。

“五四”时期扩大了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从思想文化领域对女性的解放开始了讨论和探索，只是女性自身的探索并没有超过男人们对此问题的较深入一点的认识。当大批知识女性跟随莎菲长叹短吁时，鲁迅的《祝福》、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小说已经开始从社会制度和文化根基上，对女性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清算。女人自己却没有把自己放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下面，只是把自己放在家庭、男人和情爱之中。

“五四”的女性自救的“号角”，只在小资产阶级中吹响了几声，根本就没有触碰到其它更广大的领域，也没有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去触动中国的男权文化根底。

大革命时期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女性比较广泛地参与了社会工作，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也产生了两极分化。一类女性仍旧依附于男人，做花瓶做少奶奶什么的；另一类则效法女英雄秋瑾，做剑湖女侠，投身革命。

直到红军长征，妇女完全与男性并肩战斗，与男性别无二样。尤其是那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她们不仅做到了和男人一起并肩战斗，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她们甚至还自愿或者被迫放弃了女人最神圣的权力，生育的权力。我们知道，《圣经·创世纪》中，以上帝惩罚夏娃的语言来告诉所有的女人：“我必须多多加重你怀孕的苦难，你生儿育女必须倍受苦楚”。“但是，‘苦楚’犹如十字架上的新生，女性恰可以以宗教的情绪去体味这种苦楚的幸福，因为这里蕴育着一种勃发的精神。生育，是一种充满创造力的活动，周而复始的生命形态，表明新生的可能。这份犹如女性生命意识般的无边无沿的可能性，正体现了女性生存处于一种永久性的发生意义上。”（张慧敏：

《寻求自我的艰难跋涉》）美国人类学家伊夫林·里德在《女

性的进化》中这样阐述了母亲的伟大：“母亲创造了感情，从而使人类社会成为可能。因此女性对于人类生命的创造和参与，是积极、主动、向上的。”

虽说，革命给女性带来了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的机会，也给女性提供了足够宽容的向男人看齐的机会，但又从女性的本质上剥夺了女性的生命状态。这种“非女性化”倾向与“反母性”意识，在革命的热烈气氛中，愈演愈烈。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为：革命是妇女解放的唯一出路。很快，妇女自救就被整个社会的大革命环境包容了，妇女参政被作为一种制度制定下来，妇女同志们确实也风风火火地动了起来。形式上的解放迅速掩埋了一些并未解决的实质问题，比如：男权中心，女性对自己的认识和意识，女性对自己角色的认定等等。即使是在共产党这样提倡男女平等的党派的文献中，还曾经记录着这样的文字，要求女性不要“好高骛远”，“幻想做政治家”，而应该“好好照顾革命的丈夫，扶养革命的后代”。可以想见，革命并没有让男人们真正认为女人和他们是平等的，而在一个男权社会中，男人的认为便是女人的屈从。

建国以来，又是男人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于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连外表形态都越来越一样。一张著名的摄影作品“飒爽英姿”，把中国女人的审美标准固定了下来，也把中国女人对自己角色的认定修订在“不爱红妆爱武装”的自豪感里。

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女性，都经历过全国上下一片灰或者一片蓝的统一着装时期。那巨大的单调的色块向我们走近时，正是我们接受一切新事物的孩童时期。这使得我们少年、青年时期的绚烂明媚显得格外的刺激和丰厚。这就如同刚刚经历过国民党垮台时期的混乱的中国人，都热情满腔地迎接共产党为他